

## 北京市人口在低生育率 条件下面临的挑战

徐绍雨

### 一、80年代北京市人口发展趋势及其特点

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结果表明,1990年7月1日北京市总人口已达到10 819 407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的9 230 663人增加1 588 744人,平均每年增加198 593人,增长率为17.21%,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0.05%。这样高的速度,在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仅次于宁夏回族自治区(22.53%)而居第二位。

北京市的人口净再生产率,从1974年开始就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1974年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722<sup>①</sup>),至1990年,已持续了16年。尽管如此,北京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保持正值,总人口还在继续上升。但是,经历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已明显减慢,很多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低于1%。

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汇总结果显示,1989年北京市城区(包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区)的生育率水平已降到接近最低极限。在死亡率水平缓慢下降的情况下,1989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东城区为0.896,西城区为0.876,崇文区为1.027,宣武区为0.970。就全市范围看,即使根据现行生育控制政策的要求,继续降低的潜力也已经很小了。

在生育率持续下降并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北京市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80年代以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10%的界线。这一比重从1982年的8.56%上升到1990年的10.28%,使北京市人口的年龄结构开始步入老龄社会,这给北京市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人口问题。

自80年代以来,北京市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日趋频繁。从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看,大量外省区人口涌入北京,户口登记状况的结构与1982年人口普查相比有很大变化。“常住本县、市,户口在本县、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98.02%

降到1990年的93.98%;而流动人口中居住满一年以上者的(或离开外县、市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比重上升。这是当前北京市人口前所未有的一个突出现象。

### 二、80年代北京市人口发展出现的新问题

虽然北京市妇女生育率长期以来低于更替水平,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妇女就业率等方面优于国内其它大部分省区,但是终究尚未完全脱离传统生产方式和思想意识的影响。因而,从人口再生产角度看,在巩固人口转变成果,并向我们所预想的静止人口过渡的过程中,还将遇到种种困难和阻力。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初步汇总结果,可以看到北京市人口在持续低生育率条件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大体如下:

(一)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总人口的增长幅度过大。80年代,北京市总人口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一方面,由于人口年龄结构产生的惯性作用,虽然生育率已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但自然变动仍呈现正值,出生率仍高于死亡率。这是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世界各国都大体如此。日本在1957年人口净再生产率就已达到更替水平,但总人口仍持续增长。在1957年以后的10多年中,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左右<sup>②</sup>。新加坡1966年的NRR大约是1.97,到1975年,不过10年时间,下降了一半,为0.968,已经低于更替水平。此后一直呈稳步下降趋势,到1983年又降到0.744,但人口仍然在增长,1983年增长率大约为1.1%。从1975年NRR第一次达到1.0至1985年间,新加坡总人口增长15%,年平均增长率为1.4%<sup>③</sup>。

另一方面,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北京,并有部分长期居住在这里(即指“人住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和“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人),再加上80年代净迁入北京的人口,因此,自

① 李伯华《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育率的变化(1973~1987年)》,第五次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1990年1月。

②③ Ronald Freedman: "Policy Options in Taiwan after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12 Number 1, March 1986, P.81

表1 北京市人口按户口登记状况分组的1990年与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比较

户口登记状况	1990年普查		1982年普查		1990年比1982年增长		
	人数(人)	比重(%)	人数(人)	比重(%)	人数(人)	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合 计	10 819 407	100.00	9 230 687	100.00	1 588 720	17.21	20.05
1.常住本县、市, 户口在本县市	10 168 427	93.98	9 048 254	98.02	1 120 173	12.38	14.70
2.常住本县、市一年以上, 户口在外县、市	487 491	4.51	131 664	1.43	355 827	270.25	177.78
3.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 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	31 541	0.29	2 805	0.03	28 736	1024.46	353.22
4.人住本县、市, 户口待定	83 099	0.77	35 399	0.38	47 700	134.75	112.57
5.原住本县、市, 现在国外工作或学习, 暂无户口	48 849	0.45	12 565	0.14	36 284	288.77	184.98

资料来源: (1) 1982年数据引自《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字》,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2年12月第一版, 第8~9页。

(2) 1990年数据引自《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1年2月第一版, 第6~9页。

然增长的比重已相对下降, 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已成为80年代北京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见表1)。

(二) 在低水平的基础上, 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速度明显减弱。新中国建立以来, 北京市各个阶段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 粗略估算大体如下: 50年代为5.1, 60年代为3.9, 70年代为1.9, 80年代为1.50(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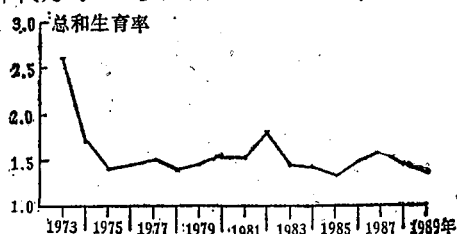


图1 北京市1973~1989年总和生育率

北京市70年代末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2以下, 因此, 80年代进一步下降更为困难。北京市1981年的TFR为1.61(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 1989年为1.33, 较之70年代和80年代的下降速度明显减弱。但在低水平的基础上, 这样的下降速度已很可观, 确是来之不易。问题是, 今后如何发展? 是稳定这一水平, 还是使之继续下降? 据北京市1990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1990年北京市的TFR为1.2586, 比1989年又稍有下降。

从整个北京市看, 进一步降低TFR水平的潜力已经很小。但是, 由于在地区之间出现的不平衡

现象, 如1989年市区TFR为1.136, 镇为1.068, 县为1.948(以上均按1990年人口普查规定的第二口径计算), 因此, 根据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 有些区县尚有一定潜力, 如房山区为2.185, 延庆县为2.240, 平谷县为2.275, 顺义县为2.298。

北京市人口的粗出生率, 1989年7月1日~1990年6月30日一年间为13.35‰, 自然增长率为7.92‰。但如果按现代静止人口的参考标准①(6.77.5岁、CBR12.9‰、CDR12.9‰、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8.5%、0~14岁人口比重为19.2%)来看, 还有一段距离, 主要表现在人口老化水平和CDR水平上。

(三) 早婚现象越演越烈, 男性更为严重。80年代以来, 北京市人口早婚现象越演越烈, 以往达到的晚婚年龄骤然下降。与1982年相比, 1990年北京市男15~21岁、女15~19岁人口中有配偶的人数大幅度上升, 这部分人占相应年龄组人数的比重也相应提高, 男女合计由1982年的0.66%上升到1990年的2.49%; 女子由0.61%上升到1.20%; 男子更为突出, 由0.70%一跃而至3.18%(见表2)。

早婚必然导致早育。早婚人数比重上升, 其后果之一表现为育龄妇女峰值生育率年龄提前。1990年与1982年两次普查结果对比就是明证。1981年育

① "World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Edited by Philip M. Hauser,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6.

表2 北京市男子15~21岁、女子15~19岁组  
中有配偶人口占该年龄组人口总数的比重  
(1990年与1982年人口普查对比)

	1990年普查	1982年普查
一、有配偶的人数(人)		
1. 男子15~21岁、女子15~19岁合计	25 542	8 110
2. 男子15~21岁	21 234	5 015
3. 女子15~19岁	4 308	3 095
二、有配偶人口占相应年龄组人口的%		
1. 男子15~21岁、女子15~19岁合计	2.49	0.66
2. 男子15~21岁	3.18	0.70
3. 女子15~19岁	1.20	0.61

①1990年普查数字系按10%提前抽样汇总数据,按样本数占全及总体的比重10.05%推算。

资料来源:

(1) 1982年数据引自《北京市第三次人口普查机器汇总资料汇编》,北京市人口普查办公室,1984年1月,第426~427页;

(2) 1990年数据引自《中国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0%提前抽样数据计算机汇总表,北京市,下册》,表09-04,09-05,09-06,09-07。北京市人口普查办公室、北京市统计局计算中心制,1990年12月10日。

龄妇女峰值生育率年龄为25~29岁组,生育率为203.23%;其次是20~24岁组,生育率为39.36%。而1989年20~24岁组生育率大幅度上升,高达109.44%,超出了25~29岁组的108.72%,从而跃居生育率峰值年龄的位置(参见图2)。

(四) 出生孩次的一孩和一孩总和生育率比重下降。自1980年以后,北京市出生孩次中一孩率有所上升。1981年一孩率为84.10%,二孩率为12.81%。多孩率(3孩及以上)为3.09%。但是,到1989年一孩率降为71.74%,而二孩率上升为24.21%,多孩率上升为4.05%。反映在生育率上,1989年一孩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重由1981年的81.89%降为72.40%;二孩从14.05%上升到23.54%,多孩均为4.06%,两者持平(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表明,1989年北京市育龄妇女出生孩次率为:一孩率76.54%,二孩率20.28%,多孩率3.18%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市县人口(按第二种口径计算)中1989年的一孩率仅为49.81%②。以上反映了北京市80年代育龄妇女平均出生孩次率呈上升趋势。

### 三、当前北京市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

综上所述,可见当前北京市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有三:

(一) 传统生育文化的回潮。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传统生育文化,即多子多福,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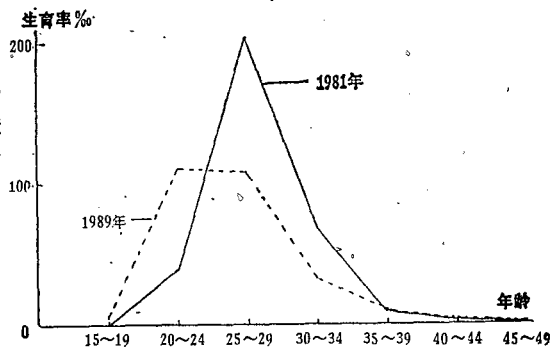


图2 北京市1981年与1989年育龄  
妇女年龄别生育率比较

意味着:普婚、早婚、早育、多育形成风气。

北京市人口生育率虽已降到很低水平,但尚未形成一种自觉的生育调节机制。也就是说,这是在政策干预下的一种节制生育活动。

从社会经济背景看,传统生育文化仍有其相应的基础。从北京的实际情况看,妇女的生育愿望与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尚有距离。当然,调查中妇女回答的生育愿望,不一定是她们的真正意愿,也并不能完全说明,如果没有生育控制,她们就会按照回答的愿望生育孩子。但是,从调查总体来看,这种答案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她们的基本生育愿望以及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1987年进行的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不同年龄组妇女的生育意愿是不一样的。“目前有一个孩子的妇女中,不想要下一个孩子的比例,30岁以下的为50%,30~39岁为60%,40岁以上则为90%;想要下一个孩子的比例,30岁以下妇女比例为44%,30~39岁组为37%,40岁以上为7%”;从调查结果中,引起人们更为注意的是,“目前已有三个孩子的妇女中,30岁以下的妇女想要下一个孩子的比例为15%”③。从城乡看,在目前有一个孩子的妇女中,想要下一个孩子的,城市为29%,农村为60%,农村相当于城市的两倍多”④。

① 《北京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90年第208页。

② 《中国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提前抽样数据计算机汇总表,北京市,下册》,北京市人口普查办公室、北京市统计局计算中心制,1990年12月。

③ 《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北京市主报告》,北京市统计局人口处,1988年8月,第56页;

④ 同①,第57页。

据《北京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7》中记载,曾出现初婚最小年龄女性为17岁,男性为19岁。这种现象当属个别。但普遍的表现是平均初婚年龄下降,以及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人口中有配偶人数比重上升。这就告诉我们,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忽视传统生育文化的挑战,那末,生育水平不是在现有水平上徘徊,就是出现回升趋势。

(二)流动人口的冲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有控制的人口迁移和较为自由的流动相结合的政策。在80年代的10年中,由外省区净迁入北京市的人口数,平均每年约有5万多人。而大量进入北京的是流动人口,特别是那些长时间居住在北京的流动人口。1990年普查中,“已在本县、市常住一年以上,常住户口在外县、市”以及“在本县、市居住不满一年,但已离开常住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人,即作为流动人口中应列入普查登记的对象,北京为519 032人,占全市普查总人口的4.80%,比1982年普查的1.46%上升了3.34个百分点。今后,如果不采取相应政策加以控制,估计这部分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还会继续上升。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笔者认为,北京市控制人口规模,在继续降低自然增长率方面潜力已经很小,应该在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重点放在完善现行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政策,严格控制住流动人口的急剧增长上。

从北京实际情况出发,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已势在必行。例如,对外地在北京从业的个体工商户(已登记执照的和无登记执照的),在北京全市劳动力资源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对其招收雇工问题要严加控制。从外地招工,还是在北京招工,要根据不同情况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统筹安排。

(三)老龄问题的出现。由于北京市执行国家制订的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政策时间较早,效果较好,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趋势发展较早、较快的后果。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64年的41.50%下降到1990年的20.48%,在26年间下降了一半,是十分惊人的。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则从6.65%上升到10.28%。1990年普查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根据10%抽样汇总数据粗略估算,已经达到110万人。

以上现象的出现,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方面是,经过这一阶段的调整,使

北京市人口逐渐向稳定,甚至静止过渡,实现更为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的一面是,在当前经济和社会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老年人口问题会给国家、企业和家庭带来更重的负担。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上升,老龄人口的赡养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那么“养儿防老”的作用就会突出起来。权衡利弊,笔者认为,从战略上看,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引来了较早、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当然,控制出生的政策要考虑到阶段性,例如,在什么时候可以放宽到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这也是与人口目标直接有关的问题。至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并不是永恒的政策,长期实施这一政策,其方向是导至人口总量的负增长。

北京市由于老年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近几年来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问题日益尖锐。在城市,国家和企业的支出大幅度增加;在农村,加重了家庭赡养老人和支付医疗费用的负担。以全市离、退休干部、职工为例,随着离退休职工的逐年增加,非在职职工的保险福利费用(包括离休工资、退休金、退职生活费、医疗卫生费、护理费、生活补贴、交通补贴、丧葬抚恤救济金及其它各项费用)呈逐年高速上升趋势。这部分费用,全市1986年为67 458万元,1987年增加到79 307万元,1989年又上升为143 707万元,其中,离休工资、退休金、退职生活费1986年为45 959万元,1987年为50 625万元,1989年为72 664万元。1989年比1986年增长58.11%。医疗卫生费1986年为9 055万元,1987年为14 998万元,1989年一跃升至38 687万元。1989年比1986年增长327.24%。以上两组数字,说明了医疗卫生费用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离休工资、退休金、退职生活费总和的增长幅度;说明了从经济负担上,老有所医处在突出的位置。

仅从以上一例,便可见到北京市未来人口老化给国家、企业和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已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为此,必须及早完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金制度,这样,也会给贯彻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解除后顾之忧。

(本文责任编辑 洪映)

(作者工作单位 北京经济学院人口所)